

1989年民主德国危机与柏林墙倒塌 之内因考察

王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作为1989年东欧八国政治巨变中的一环, 民主德国危机与柏林墙的倒塌具有其独特性。匈牙利民主化改革、联邦德国对“东方政策”的背离以及二者的结合直接导致了东德危机的全面爆发。昂纳克的继续保守引起苏联的不满致使他下台。克伦茨的“变革”计划面临着外债缺口与政治民主化的双重压力, 他与戈尔巴乔夫周密设计的改革计划也未能解决“要么民主化、要么经济崩溃”的核心矛盾。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削弱了四大国的合法权利、激励了民众的统一热情、直接动摇了东德政府的控制力与改革计划, 并使德国问题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议程。但不论柏林墙是否倒塌, 克伦茨的改革计划都难获成功, 东德民主化的脚步也难以停止。

关键词: 1989年; 民主德国危机; 柏林墙倒塌; 东欧剧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2-0193-08

1989年东德危机与柏林墙的倒塌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国内外史学界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国外学者多以冷战后开放的东德政府档案为基础, 从东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在层面解读危机的缘起与推演进程,^①也有部分学者依据早期的东德和苏联档案, 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出发(特别是苏联)来讨论其对民主德国危机、柏林墙的倒塌甚至德国统一的政策长线的影响。^②从现实关怀角度, 我国学者则更加关心柏林墙倒塌的动因并就此形成了一些学术争论。^③实际上, 民主德国危机的全面爆发、柏林墙的倒塌很大程度上与外部因素或外部环境的诱使有关, 本文拟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解读这种由外到内的关联性。而一些新近公开的档案文献如《戈尔巴乔夫与德国统一文件汇编》(2011)、《欧洲冷战的和平终结》(2010)、《国际安全档案电子简报: 柏林墙的倒塌25周年纪念》(2014)等,^④加上90年代解密、尚未被我国熟知与利用的东、西德档案^⑤为此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难民危机

1989年上半年, 由于苏联方面的无所作为, 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早在3月

初, 匈牙利总理内梅特就试探性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能否拆除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铁幕”, 戈尔巴乔夫模糊地回应“我们在边界问题上有着严格的制度, 但我们也正变得更加开放”。^{[1](412)}匈牙利逐步拆除边界铁丝网的动作原本只是一种蕴含着民主与开放的象征性举动, 但东德民众从媒体报道获知这一消息后, 在暑假期间利用“度假者”的身份前往匈牙利, 期望能够借道奥匈边界前往西德。

不过, 东德民众只有持有有效证件才能顺利通过奥匈边界, 那些试图非法过境的人纷纷被逮捕或遣送回国。^[2]一些被拒绝出境的东德人开始前往东欧各国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 在使馆逗留的人数逐步攀升使东德政府愈加不安。^[3]但初步的异动局面不足以动摇昂纳克的保守态度。1989年5月初, 他对与他同属保守派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米洛斯·杰克斯说, 西德政府依旧没有准备放弃它颠覆东德的老目标, 虽然在世界上谈论那些“普遍人道主义的大环境”是没有错, 可“我们深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4](123)}6月9日他在与谢瓦尔德纳泽会晤时, 不仅表达了对“波兰可能会失去社会主义……匈牙利将进一步滑入资本主义阵营”的担忧, 而且甚至担心苏共不能再继续领导苏联。^{[1](460-462)}

对于发展越来越迅速的难民潮和可能爆发的难民危机, 匈牙利和西德在整个7月仍然坚持常规手段帮

收稿日期: 2015-08-21; 修回日期: 2016-03-13

作者简介: 王帅(1983-), 男, 江苏连云港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欧洲国际

助遣返难民或要求东德政府尽快出台解决难民危机的方案。那些在奥匈边境森林被抓捕的东德人被匈牙利政府强制遣返东德,且匈牙利当局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上印有标识的印戳,这些难民将面临着国内处罚。^{[4](125)}西德则像以往一样坚持“东方政策”既定传统,并不打算接受这些非法潜逃的难民且尽力劝说他们回国。西德总理府主任鲁道夫·塞特斯在7月4日同昂纳克会晤时要求昂纳克尊重赫尔辛基协定,即尽快在旅游方面作出开放举动以缓解危机,并指出这是西德政府坚守“东方政策”的前提。昂纳克认为赫尔辛基协定的重点在于承认东德的合法存在而不是人权,所以“并不需要对新的旅行法有所可能性的承诺”。^{[5](331-336)}

1989年8月初,在民主化压力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认为,继续固守社会主义集团内部严苛的入境协定、非人道地对待那些渴求自由的难民、积极充当东西德之间保守的边界警察等只会增强国内反对派的协商砝码并使改革派失去控制改革进程的机会,因而7月的难民政策随之得到改变:匈牙利政府不再在难民的护照上盖上有标识的印戳,这就意味着这些难民将不再面临东德政府的惩罚,其结果也鼓励了更多人前往匈牙利。许多东德民众要么在匈牙利继续逗留以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要么前往当地的西德大使馆寻求避难。8月7日,西德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已聚集了约200名难民。^{[4](125)}8月9日,匈牙利政府不再强制遣返东德移民,这种宽容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接连不断地前往边境(每周约几百人成功越境)。^[6]

西德政府也变得具有侵略性。8月11日,131名东德难民被允许进入西德常驻东柏林代表处避难。西德总理府代表表示将不再驱逐这些难民,同时建议这些难民只有在“东德政府允许他们离开东德的情况下”才离开代表处,这显然是科尔政府对昂纳克的直接施压。东德外交部副部长赫伯特·柯里柯夫斯基质问塞特斯·波恩将如何处理这些难民,塞特斯像以往一样表达了虽然东德有权制定它自己的国内旅行法,可波恩有义务就全体德国人的利益展开谈判。^{[7](197-201)}

为了使在东欧各国大使馆及代表处的东德难民和平离开,东德准备好了承诺不对难民进行惩罚,但并未准备好让这些难民直接离境,因为“给予那些非法聚集在大使馆的难民特别优先权是不可能的”^{[4](127-128)}。昂纳克在8月30日给科尔的信中仍强硬地表示西德的做法“否定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根据国际法,联邦德国没有权利处置来自于民主德国的公民”^{[4](128)}。

8月22日,科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吹响了助燃难民危机的号角,他宣称“东德人对东德政府的拒绝

清晰地反应出德国问题仍处于议程之中”^{[8](89-10-25)}。波恩决定从已经接受民主化以及西方多元主义价值的匈牙利入手。匈牙利政府正处于改革最为关键的时刻,改革派政党不仅想要控制整个民主化的过程,而且试图使国内经济在一个即将出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软着陆,它们也更需要以西德为核心的西方阵营提供经济改革所需的经济援助与贷款。^{[4](128)}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加上苏联中立及不干涉的态度,因此,很难想象匈牙利政府会继续秉持其与东德在1969年6月20日签署的相互尊重旅行限制的协议。

8月25日,科尔、根舍与内梅特、霍恩(匈牙利外长)在波恩附近的圭姆尼希宫(Schloß Gymnich)举行了秘密谈判。就在谈判前一天,匈牙利边防士兵开始驱赶东德难民以制造紧张情绪并增加谈判砝码。25日的会晤中,内梅特向赫尔汇报了匈牙利目前的经济困难,他承认戈尔巴乔夫与经济互助委员会都不能给匈牙利提供帮助,只有西方能做到这一点。他问科尔:“我请问您,总理,我们能否指望的上您的帮助?我不仅指联邦德国,而且指整个西方。”科尔与根舍基本上答应了联邦德国将从联邦德国本身、欧洲共同体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个层面提供切实帮助,^{[5](377-380)}内梅特表示“我们开放边境,只要没有外部军事势力或政治势力强迫我们采取其它行动,我们将始终为民主德国的公民开放边境”^[9]。霍恩在8月31日随即告诉东德外长奥斯卡·费舍尔,如今在匈牙利的东德难民已经达到了15万人之多,匈牙利不会用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如果奥地利给东德人发放过境护照,那么在匈牙利的这些东德难民将于9月11日被准许通过边检站。^{[4](126)}

统社党政治局对匈牙利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十分不满,费舍尔向苏联提议召开华沙成员国外长会议以期借苏联为首的联盟体系向匈牙利联合施压,苏联的态度十分犹豫。^{[1](515-516)}9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费舍尔、库特·哈格尔、埃里希·米尔克再次提议求助于苏联并召开华沙外长会议。^{[1](515-516)}在费舍尔的要求下,苏联驻东柏林大使库什马索夫与他进行了单独会晤,让费舍尔失望的是,库什马索夫告诉他,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正试图影响一些匈牙利的党内同志,而驻西德大使科维钦斯基已经同塞特斯进行了磋商,科维钦斯基仅仅表达了“持续的局面可能导致两德之间的民众交流受到限制”。^{[1](517)}虽然谢瓦尔德纳泽同情地对费舍尔表示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波恩宣称自己才是全体德国人的代表,^{[4](129)}但他显然不愿意在他第一次前往美国之前(9月21日)召开一次华沙外长会议并重新回到勃列日涅夫发号施令式的老

路上。即使是到了难民危机最为高潮的9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也竟全然不提此事，^{[1](533-541)}苏联外交部的一些人仍然以为难民危机“也许不全是坏事，它可能刺激昂纳克接受一项改革议程”。^{[10](71)}

9月10日，匈牙利宣布第二天将对东德难民完全开放奥匈边界。9月11日，约有8100人流向边界，随后的三天内人数达到了1.8万，^{[4](126)}到了9月末，约4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去往西德。东德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难民潮的严重威胁。

捷克斯洛伐克的难民情况并没有比匈牙利的好到哪里。匈牙利开放边界后，捷克斯洛伐克立即宣布对东德人关闭捷-匈之间的边界，那些无法逃越尚未拆卸的边界铁丝网的难民索性集聚在了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附近。9月初，数千名难民在大使馆周围安营扎寨，其境况一片肮脏、混乱，并具有发生大规模流行疾病的高度风险，难民同当地警察的冲突也愈加频繁。尴尬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既不想让这些东德难民直接前往西德并破坏东德政府的合法存在，也不想在国际社会面前充当保守的边界警察强行遣返难民，9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要求昂纳克尽快提出解决难民危机的方案。

与此同时，西德驻布拉格大使致电波恩表示，布拉格的难民数已达2500人的“关键上限”，且东德及苏联一直利用西德的“非人道主义行为”陷西德于尴尬境地。西德外长根舍试图劝说捷克斯洛伐克让难民离开大使馆前往西德^{[11](30)}，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以如果让这么多的人群自由地行动，那么将对国内的民众及反对派产生“示范效应”为由拒绝了根舍的提议。^{[10](75)}

难民营的状况每况愈下，根舍利用他在纽约参与联合国大会的机会试图再次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德协商难民事宜。捷克斯洛伐克外长乔哈内斯冷漠地表示难民事件是两德政府之间的事。^{[11](33)}9月27日，根舍同费舍尔会晤，东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通牒压力连同自身合法性危机凸显的情形下态度较为缓和，看起来乐于考虑解决布拉格难民事件。就在费舍尔进一步询问东柏林以获得授权期间，西德驻布拉格使馆再次发来了令人“不安”的电报，电报称难民人数已然超过了2500人且每个小时都在不断增加，这可能导致一场大的“灾难”。情急之下的根舍请求谢瓦尔德纳泽出面帮助解决难民危机，谢瓦尔德纳泽答应给予直接支持并承诺给东柏林、布拉格和莫斯科发出“合适”的电报；根舍还请求法国外长杜马以欧共体十二国的身份(法国当时是轮值主席国)出面对乔哈内斯施压，杜马答应给予帮助；到会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

愿意伸出援助之手。^{[11](32-42)}迫于多方压力，加上东德政府正准备建国40周年庆典，昂纳克本身也想找到一个体面的脱身方法，东德最终同意让这些难民离开布拉格并前往西德，只不过他们需乘坐密封的火车经东德领土后再开往西德，这彰显了东德对处理这些难民拥有的合法权利。1990年10月3日，东德宣布封锁它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从6月一直持续到10月初的难民危机看上去告一段落。

二、民众游行与“变革”计划

自1989年3月开始，东德的各大城市陆续地出现了一些聚集起来的抗议者，他们公开要求政府开放对旅行的限制。保守的东德政府往往通过暴力抓捕、威胁让其失业等手段来遏制游行示威。^{[12](28)}5月7日的地方选举后，包括教会祈祷者、旧工人阶级等在内的抗议者更为强烈地要求旅行和移民自由；8月28日，一些牧师和一群“和平与人权”派代表号召成立新的社会民主党以推行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9月9日，反对派群体宣布建立“新论坛”(Neues Forum)；9月19日，大学里开始讨论起“为什么新论坛不能被合法化”，直到9月25日，莱比锡公开爆发了数万计的民众集会游行与抗议示威。

东德当局的所有重心在这一时刻都聚焦在了捷克斯洛伐克难民危机上，他们更加关注那辆即将由德累斯顿开往西德的、装满了东德难民的列车。10月2日，装满难民的列车经过德累斯顿时，1500名左右的当地居民聚集在火车站欢送那些昂纳克本想用此举来羞辱他们的难民。早已准备就绪的德累斯顿当局并没敢开枪制止示威人群，“警察不敢开枪的消息，在几个小时内就传开了，先是莱比锡，接着是柏林”^[13]。就在当天，莱比锡再次爆发了10万人大游行，民众一边呼喊着“我们将待着这儿”，一边呼吁将“新论坛”合法化并实施改革。^[14]

为了给即将到来的40周年国庆日庆典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塑造安定和平的氛围，东德当局不得不在10月4-8日期间开始考虑如何应对一波高于一波的民众游行危机。斯塔西领导人米尔克命令工人民兵队(Kampfgruppen)“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彻底地阻止敌人的负面行动”，“那些通常配备武器的人员继续与往常一样”。^{[12](199-201)}东德的警察力量开始冲破游行人群，这造成了一些示威民众的受伤，政府集结了大批的坦克以及高压水枪并且安排好了医疗部门的床位及血浆供给，看起来准备以严酷的手段抵制周一莱比锡

即将爆发的大规模游行。^⑥

不过,统一社会党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昂纳克的接班人厄贡·克伦茨、冈特·沙博夫斯基在内的改革派反对对游行群众使用暴力。就在10月9日大游行的前一天夜里,克伦茨打电话给苏联大使库什马索夫,告之昂纳克让他来负责莱比锡事件,昂纳克、米尔克等以及坚定份子已准备好了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库什马索夫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采取镇压手段,也肯定不能动用军队”,克伦茨认可。库什马索夫还命令那些驻守在东德的苏联士兵待在他们的兵营中不得外出。^[15]东德一些地方领导人甚至与游行领袖达成协议:如果游行示威活动保持平和,那么地方当局将不会使用武力。^{[4](144)}

“在权力与现实间的沟壑越来越深之际”^{[8](89-10-04)},如果继续再让昂纳克掌握政权,不但整个东德将成为暴力革命的牺牲场,已经失控的局面将进一步迈向崩溃的深渊。戈尔巴乔夫在10月7日做了他早在1987年就该做的事——前往东德剥夺昂纳克的权威。戈尔巴乔夫“不打算说一句支持昂纳克的话,但打算对东德以及整个革命给予支持”^{[1](542)}。10月7日在与昂纳克单独会晤中,他做了最后努力,“一个政党一旦不能够吸纳服务整个社会的所有动力,那么他们就寸步难行……党必须要掌握主动性,我们不能够落后”,昂纳克依然顽固地强调“要竭力澄清那些没能够得到足够重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状态很好……尽管存在问题,但我们为积极地解决社会问题、以及首要地解决住房问题而感到高兴。我们持续地掌握着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16](187-190)}

戈尔巴乔夫在随后的与东德政治局全体成员会晤中公开说到:

从我们的经验、从波兰和匈牙利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如果党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如果没有反应现实需求,那它注定要走向末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领导人根本不敢拉动马车,但我们也不敢取代他们,我们害怕冒犯他们。与此同时,问题持续扩大且变得十分痛苦。总的来说,党已危机四伏。^{[16](191-197)}

以克伦茨为首的改革派很快领会到了苏联的意思,他们从攻讦失去莫斯科保护的昂纳克的得力助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米塔格开始,在一些地区领导人(包括汉斯·莫德罗)的支持下,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最终于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昂纳克发难,要求他离开领导职位并由克伦茨接任。^⑦

克伦茨接任昂纳克两天之内就提出了他的“变革”(Wende)计划,该计划承诺基于宪法之上的选举以及以

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显然延续了统社党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地位,西方认为克伦茨的改革计划并不是真正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与新思维”。^{[8](89-10-20)}面对持续进行的民众游行和反对派要求变革的压力,政治局不得不具体研究东德究竟该如何变革、往何处变革。

10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参与商讨“变革”的经济学家传来了雪上加霜的消息:截止到1989年10月底,东德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不得不大幅削减经济和社会开支、主动将民众生活水平降低25%~30%的境地,而通过暴力手段稳定人民的方式将摧毁统社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为了保障国家的偿付能力,必须同西德政府商讨大约20~30亿东德马克的援助”^[17],而为了让西德的保守(基民盟)——自由(自由党)联合政府答应这笔援助,“应该提供一种筹码——即便是早在本世纪之内,也要使两德之间的边界变得多余。”^[17]政策规划部主任舒尔甚至建议用柏林墙换西德马克,他敏锐地看到“如果这些要求最早是从街头或工厂里提出,这将限制我们采取主动措施的可能”。克伦茨显然没有准备好拆除柏林墙并走向两德任何形式的合并之路,他命令舒尔排除任何提及“统一”与“邦联”(confederation)的可能,政治局采用的最终方案也删除了草案中提及两德边界的部分。^[17]

第二天克伦茨便前往莫斯科。一方面,他作为新任的东德领导人需要及时地向戈尔巴乔夫汇报东德的国内现状以及他未来的具体计划以获得苏联对他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克伦茨想要知道能否从莫斯科获得经济上的帮助。恭敬的克伦茨用俄语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双方以批评昂纳克为始,针对民主德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两德关系、德国统一以及克伦茨未来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问题深入探讨。^{[16](213-227)}

第一,东德外债问题。克伦茨向戈尔巴乔夫汇报10月31日政治局对东德经济情况的讨论结果,他认为东德的经济局面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束缚了采取必要的政治决定。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东德的外债到1989年高达265亿美元,1989年的现金账户赤字达121亿美元。戈尔巴乔夫吃惊地询问这些数字是否准确,但同时指出苏联自身“也处于相同的境地”,他建议找到一种方式让人民了解真相,同时也承诺苏联将继续履行它同东德之间的经济义务关系,包括提供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克伦茨深知戈尔巴乔夫在面临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能力帮助东德渡过债务危机的难关。^{[16](213-227)}

第二，两德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考虑到东德目前的经济状况以及它与西德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一种即有原则又有弹性的对德政策，西德看起来正在对东德施加压力，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行事，即关于东德问题的决定是由柏林作出而不是由波恩，但我重申，你需要具备足够的弹性。”克伦茨表示赞同，他说，“……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东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苏联的孩子，一个人必须承认他与他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他继续询问戈尔巴乔夫究竟把东西德置于欧洲大家庭当中的何种地位？戈尔巴乔夫回答：

雅科夫雷夫与布热津斯基昨天刚刚举行了会晤，布热津斯基说，如果当下的事件演变成了两德统一的事实，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灾难……所有的政治家——撒切尔、密特朗、安德莱奥蒂、雅鲁泽尔斯基、以及美国，虽然美国的立场看起来与前者有些差别（沙赫纳扎罗夫插嘴说美国的表态只不过是为了国内需要，戈尔巴乔夫认可），都不想看到德国统一……最好的方法便是强调当下的局面是历史的结果。^{[16](213-227)}

戈尔巴乔夫继续为克伦茨设定了东西德关系的三原则：一是，东德与莫斯科之间不应有什么秘密，双方应共同协调处理东德-西德-苏联三角关系。二是，莫斯科可以无限接近西德，但东德不能。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德国相信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实现德国统一，美国表面上支持德国统一，实际上却告诉德国关键在莫斯科，这样一来莫斯科就成了“黑彼得”(Black Peter)，^⑥想要打破这一点，就必须在苏联-美国-西德这个大三角关系中强化莫斯科与西德的关系。而东德发展同西德的关系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要不能让意识形态的敌人抓住任何的优势，为了防止东德私下里落入西德的怀抱，戈尔巴乔夫甚至将两德关系与提供原材料挂钩以做威胁。三是，鼓励东德发展同除了西德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匈牙利和波兰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16](213-227)}

第三，旅行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如果东德不能够找到“允许其人民探访其亲属”的方案，那么整个东德社会都会对此感到不满，东德也很可能面临着新的通牒，必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克伦茨解释说，东德已经准备好了①停止在边界线使用暴力；②政治局出台了新的旅行法，在圣诞节之前将由人民议院(Volkskammer)授权通过；③不幸的是东德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外汇以供旅行。^{[16](213-227)}

第四，国内改革计划。克伦茨表示将在11月8日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进一步讨论东德的未来：一是要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非常清楚的是，

问题的答案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当中寻找，而不是在自由市场中；二是关注社会民主的广泛发展，包括选举法在内的一系列新法都在筹备当中，将处理宪法问题，如媒体自由、“公开化”、以及个人的自由及尊严，在这些新情况下党的领导地位需要进行讨论。^{[16](213-227)}可见，克伦茨的改革计划并不想走波兰与匈牙利的道路，他拒绝市场经济以及多元民主。

第五，民众游行问题。克伦茨声称统社党政治局已经决定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民众游行问题，游行将被合法化且不会有警察力量对抗他们。不过，承认反对派“新论坛”还没有被决定。周末预计有50万人的大游行，为了阻止反对派在游行队伍中发挥影响，政治局决定派党员(沙博夫斯基)参加游行，同时将采取某种措施阻止人群试图穿过柏林墙，这是糟糕的，因为可能会采取调遣警察以及颁布类似于戒严法令等手段。^{[16](213-227)}

戈尔巴乔夫与东德新领导人协商好了全面而周密、致力于稳定东德国内局面并有序推动国家改革的一篮子计划，不过，苏联仍然对这组计划能否成功推进抱有疑虑。当克伦茨带着“戈尔巴乔夫-克伦茨计划”离开莫斯科后，11月3日的苏联政治局每周例会上，戈尔巴乔夫担心“如果我们失去东德，我们将无法向我们的人民交代。可没有西德的帮助，我们没办法保证东德还能浮在水面”，谢瓦尔德纳泽建议“如果是我们自己亲手拆除柏林墙，那会更好一点”，戈尔巴乔夫认为“东德一旦进入世界价格市场，他们的生活水平将立即降低……我们将在有东德加入的三角关系中来对付西德”。^{[18](Doc-6)}

三、“变革”计划的破产与柏林墙的倒塌

想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稳定政治局并重新恢复社会秩序，克伦茨需要同时满足①请求西德给予经济援助；②民众游行所提出的要求：旅行自由、实施新的选举法、承认反对派等。他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努力。

11月6日，长期负责同西德进行秘密谈判的沙尔克向西德总理府主任塞特斯以及内政部长朔伊伯勒请求120-130亿马克贷款，“朔伊伯勒显然是在总理(科尔)的指示下小心行事”，他清楚地表明“很多事情取决于总书记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东德宪法的第一条将马列主义政党定性为领导者，在这种情境下产生了根本性的问题……宪法的修正应把统社党的领导地位转变成一个建设性的、在所有民主力量中

建立合作共识的党……建议西柏林的边界(柏林墙)更加畅通”,他最后强烈建议克伦茨在11月8日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应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这样的话,科尔没有正当的理由说服议会给东德提供援助。^{[19](151-152)}

当晚6点西德召开国务秘书紧急会议讨论援助问题,西德方面认为“由于我们的利益是,在变化中寻求(东德人民)更好的生活水平,但长期而言须推动一个更为自由的东德,所以我们不能够拒绝东德的合作请求,但这种合作也必须不能够用来维护现行体制与政权的稳定,相反,应对其保持改变的压力”。^⑥赤裸裸背叛“东方政策”的意图第二天(11月7日)被直接传达给了东德:想要得到经济援助必须放弃统社党的绝对权威。^{[19](15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西德的消息传达给东德当天,东德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仍然认为立即执行新的旅行法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还想用旅行自由为筹码换取西德更多的经济援助。^[17]

满足游行民众的诉求与争取西德援助基本上同时进行。11月1日重新开放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边界;11月3日宣布改组政府,由支持改革的莫德罗担任政府领导并承诺给予“新论坛”及其他反对派合法地位;11月6日公开宣布(早在10月20就已计划)新的旅行法草案,承诺在政府颁发签证的条件下(无特殊情况不会加以限制)公民每年可出国旅行一个月。不过,这些行动并没能充分满足民众诉求,新旅行法草案公布当天,莱比锡的游行民众反对这份新草案并要求在没有任何签证和立法的情况下自由旅行,他们还进一步要求推翻柏林墙甚至是统社党的统治。^{[4](159)}

重新开放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也给东德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边界开放之后,布拉格的西德使馆再次聚集了大量人群,仅在11月4~6日的周末,就有约2.3万东德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前往巴伐利亚州。11月8日,饱受难民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向东德表示,东德民众离开东德前往西德必须得到直接处理,他们不能再继续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前往西德。^{[18](Doc-8)}在民众游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捷克斯洛伐克通牒关闭捷-民德边界的压力下,统社党中央政治局要求克伦茨创设一部更为宽松的旅行法,东德告知莫斯科新旅行法中有关长期离境的部分将会被提前实施,并进一步询问戈尔巴乔夫的态度。^{[7](225-226)}

末等戈尔巴乔夫答复,11月9日上午,两名内政部官员以及两名斯塔西成员把他们再次修改好的、更加自由的旅行法送交中央委员会。为了避免形成焦点并引起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他们决定在10日凌晨4点才向公众公布新旅行法的信息。新的临时旅行法令

规定:①私人申请到国外旅行不需要再提供以往的证明性材料,旅行授权将在短时期内被批准;②对长期离境者,护照管理部门以及人民警察的注册登记部门不得延误、也不再需要先前的证明性材料;③长期离境可通过东德与西德以及西柏林的所有边境线出境;④只凭借东德居民个人身份证经过第三国长期离境的临时性规定将被终止;⑤该临时性规定将在11月10日向媒体释放消息。^{[19](155)}

9日下午,中央委员会不出意外地通过了该旅行法令并通过“快速渠道”(Umlaufverfahren)交给部长会议决议^{[19](156-157)},末等部长会议正式通过法令,克伦茨便把草案交给政府发言人沃夫冈·梅耶以及当值的中央委员会发言人沙博夫斯基,要求他们立即把法令公之于众。梅耶已经收到了来自内政部和斯塔西的指示(10日凌晨4点公布消息),但沙博夫斯基并不知情,他在随即召开的(18点)党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新的旅行法案。当记者们询问他这部旅行法将于何时生效时,他在不了解法令具体内涵的情形下回答说:“立即,绝不延误!”^{[19](157-158)}全美广播公司(NBC)记者布罗考问沙博夫斯基,“对东德人来说是否可以在某些地方穿过柏林墙”,沙博夫斯基回答到,“对他们来说穿越边界是可能的……这不是旅行问题,这是允许他们离开东德。”^{[17](137)}

一时间,所有的欧美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东德政府已经开放了它所有边界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东德民众看到新闻后前往北勃兰登堡大门的勃恩霍尔姆边防检查站一探究竟,此时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才刚刚结束,中央委员们即便被这一消息所震惊,也没有足够时间和准备来解决柏林墙边上的危机。边防检查官“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自行决定放弃所有控制”^{[17](138)},11点30分,勃恩霍尔姆的边界闸门被打开。没有任何暴力镇压与坦克对峙,没有任何大国协商或谈判交易,标志着东西方及欧洲冷战之地缘分界线的柏林墙在它被立起28年后轰然倒塌。11月1日克伦茨还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将采取某种措施阻止人群试图穿过柏林墙”,如今人群蜂拥穿过柏林墙的事实已赤裸裸地摆在了戈尔巴乔夫面前。10日早,库什马索夫告诉克伦茨苏联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解,对克伦茨的无所作为感到生气,克伦茨解释说他已经通知了苏联,库什马索夫表示即便是开放边界也不应以这种方式,与柏林相关的事务还牵涉到四大国的权利。^[20]

柏林墙的倒塌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东德政府原本设想从11月10日起主动打开包括柏林墙在内的东西德边界,使那些持有护照的人(约400万人)有序离开东德以缓解当下的民众压力,但克伦茨、沙博夫

斯基与政府之间的信息阻滞、沙博夫斯基本人对新旅行法的错误理解、加上西方媒体的广泛宣传使柏林墙被偶然地提前、被动、无序地打开。

柏林墙的偶然、被迫、非主动打开不得不说对现实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1971年《柏林四方协定》规定了四大国仍对柏林及柏林墙享有应有的权利，如今这种权利已经被革命的东德民众所打破，四大国想要再恢复权利并利用权利管制德国统一看起来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打破四大国权利的是东德民众而不是东德政府，恢复权利意味着与民意背道而驰而不只是简单地对东德政府加强控制；其二，柏林墙开放之前的民众游行，多以“我们是人民”为口号，很少有人提到“我们同属一个民族”，民众利用自身力量成功穿越柏林墙的行为不但加深了他们对自身力量的自信，也让远远超过四百万的东德民众看到了西德发达的生活水平，自此之后的民众游行开始以“我们同属一个民族”为口号要求实现东西德的再统一，科尔也正是在东德民众统一热情的激励下，才胆敢提出他公开呼吁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其三，如果柏林墙没有被以这种无序的方式打开，东德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可能稳定局势并维持政权，它可以和莫斯科一步步地商讨具体对策来共同应对西方的挑战，德国问题也很可能得不到国际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并占据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两德统一也将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总体而言，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墙的偶然倒塌削弱了四大国的合法权利、激励了民众的统一热情、动摇了东德政府的控制力与改革计划，也把国际社会的目光自然地聚焦在了德国问题上。

不过，即便是没有这一出历史偶然，即便东德政府在11月10日顺理成章地主动开放了柏林墙，克伦茨的改革计划也难以继续推进：西德给予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放弃统社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必将克伦茨置于一个要么实质性地推进国内政治自由化改革、要么面对经济崩溃并爆发全面革命的境地。历史表明了东德无法承受后者之痛，它无奈地选择了开放选举以及政治自由化之路。正如科尔相信的那样，一个民选的东德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德国统一。^①

四、结语

匈牙利民主化改革以及西德政府对“东方政策”的背离这两点要素的交互作用是东德难民危机发端和升级的主要动因。匈牙利追求西方的价值、需要西方的援助，没有理由不听从西方的安排。西德看准了“东

方集团内部出了问题、东方国家亟需同西方国家搞缓和”的局面是放弃“东方政策”的最好时机，它利用自己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与迫切需要西方给予援助的匈牙利联手将难民危机推向了高潮。过于顽固的昂纳克曾在“缓和”时期被勃涅日列夫用来替代拒绝“缓和”、态度保守的乌布利希，但他好像没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面对西德步步为营地颠覆、东欧盟国釜底抽薪式的“背叛”、连同苏联“以危机促改革”观念下的袖手旁观，依然拒绝变革的他除了离开政治舞台别无选择。

克伦茨的“变革”计划面临着外债缺口与政治民主化的双重压力，他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援助并没有得到预期结果，戈尔巴乔夫与他虽然设计好了全面周详的改革计划但却无法解决核心问题，以至于苏联本身对这个计划都不抱希望。继续寻求已然放弃“东方政策”之西德的帮助也不出意外地被告知需要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援助挂钩。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刚刚开始，由于体制的不畅、个人的失误以及西方媒体的宣传致使柏林墙被迫、无序地打开。柏林墙的偶然倒塌削弱了四大国的合法权利、激励了民众的统一热情、直接动摇了东德政府的控制力与改革计划、使德国问题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议程。不过，纵使柏林墙没有因失误被偶然打开，克伦茨的改革计划依旧难以继续推进；而一旦他无奈地选择放弃意识形态以及党的领导地位，那么就如同西德设想的那样——合法性根基的崩溃自然把两德统一提上了议事日程。

注释：

- ① 如 Charles S. Maier,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Timothy Garton Ash, *In Europe's Name: Germany and the Divided Contin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ekka Kalevi Häemäläinen, *Uniting Germany: Actions and Reac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eter H. Merkl, *German Unification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G. Peter Wallach and Ronald A. Francisco, *United Germany: the Past, Politics, Prospect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2.
- ② 如 Rafael Biermann, *Zwischen Kreml und Kanzleramt: wie Moskau mit der deutschen Einheit*,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97;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nnes Adomeit, *Imperial Overstretch: Germany in Soviet Policy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An Analysis Based on New Archival Evidence, Memoirs, and Interviews*,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1998.
- ③ 如鲁品越：“产业结构变迁与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李华：“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2期等。

- ④ Aleksandr Galkin und Anatolij Tschernjajew Hrsg.,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die deutsche Frage: Sowjetische Dokumente 1986-1991,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MGDF: SD);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and Vladislav Zubok eds.,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MH: PECWI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25th Anniversary, EBBs.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index.html>.
- ⑤ Hanns Küsters und Daniel Hofmann Hrsg.,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utsche Einheit Sonderedition aus den Akten des Bundeskanzleramtes 1989/90,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1998(DESE); Detlef Nakath und Gerd-Rüdiger Stephan Hrsg., Countdown zur deutschen Einheit: eine Dokument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1987-1990, Berlin: Dietz, 1996(CDE:DGDDDB); Daniel Küchenmeister Hrsg., Honecker, Gorbatschow: Vieraugengespräche, Berlin: Dietz, 1993等。
- ⑥ 莱比锡在9月25日到10月16日的每周一都爆发了民众游行,这源自于尼古拉大教堂从1982年形成的周一下午5点的祈祷者集会。
- ⑦ 关于克伦茨、沙博夫斯基、斯多夫如何对昂纳克实施政变的详细过程,可参见 Charles S. Maier,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6-158.
- ⑧ 德国的一种卡牌游戏,“黑彼德”是一张在游戏临近终结之时每个人都不想拿到的牌。
- ⑨ 11月6日沙尔克发出援助请求当晚西德就已经决定把进一步提供援助与统社党放弃垄断性权力挂钩,伊丽莎白·庞德认为科尔在11月8日的议会发言中公开将二者挂钩是因为“一名东德的中间人的请求”,事实上无论是否有这样一位“中间人”请求科尔公开对统社党施压以期能够获得进一步援助,科尔早已决定放弃“东方政策”并一步一步将统社党逼上绝境。Besprechung der beamteten Staatssekretäre in Bonn, Nr. 74, DESE, p. 482; Elizabeth Pond, *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p. 131.
- ⑩ 11月16日科尔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东德进行自由化改革,他也相信选举出来的德国政府想要实现德国统一,参见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0.
- [4] Charles S. Maier.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 Hanns Küsters, Daniel Hofmann.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utsche einheit sonderedition aus den akten des bundeskanzleramtes 1989/90* [M].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1998.
- [6] Dennis Bark, David Gress. *A history of West Germany: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1963—1991* [M].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3: 597—598.
- [7] Detlef NakathGerd-Rüdiger Stephan. *Countdown zur utschen Einheit: eine dokument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1987—1990* [M]. Berlin: Dietz, 1996.
- [8] CWIHP Document Reader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B/OL].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the-end-the-cold-war>, 2016-03-11.
- [9] 赫尔穆特·科尔. 我要的是德国统一[M]. 葛放等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53.
- [10] 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 Frank Elbe, Richard Kiessler. *A round table with sharp corners: the diplomatic path to German Unity* [M]. Baden-Baden: Nomos, 1996.
- [12] Armin Mitter, Stefan Wolle. “Ich liebe euch doch alle!” Befehle und Lageberichte MfS Januar-November 1989 [M]. Berlin: BasisDruck, 1990.
- [13] 弗雷德里克·泰勒. 柏林墙[M]. 刘强译. 重庆: 重庆出版集团, 2009: 296.
- [14] Petra Bornhöft. *Ihr konnt abdanken, jetzt sind wir dran!* [J]. *DDR Journal*, 1989(4): 22-24.
- [15] Wjatscheslaw Kotschemassow. *Meine letzte mission* [M]. Berlin: Dietz, 1994: 168-170.
- [16] Aleksandr Galkin, Anatolij Tschernjajew.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die deutsche Frage: Sowjetische Dokumente 1986—1991* [M].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 [17] Hans-Hermann Hertle. *The fall of the Wall: The unintended self-dissolution of East Germany's ruling regime*. *CWIHP, Bulletin* [J]. Issue, 2001(12): 131-140.
- [18]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s (EBBs),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25th Anniversary, 2014*. [DB/OL].<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490/2016-03-11>.
- [1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DB/OL]. <http://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series/cwihp-bulletin>, 2016-03-11.
- [20] 厄贡·克伦茨. 89年的秋天[M]. 孙劲松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224-225.

参考文献:

- [1]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Vladislav Zubok.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M].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Jonathan Greenwald. *Berlin witness: an American diplomat's chronicle of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 [M].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23.
- [3] Elizabeth Pond. *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 [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90.